

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历史意义

李竹雪 赵军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历来为理论界所重视,在现代史、革命史、党史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九七九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郭罗基同志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的文章,说“一九五一年《分析》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很大的改动,增加了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议论纷纷。从此,对《分析》一文的评价,每况愈下。然而,郭文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

《分析》最早发表于何时,中间作了几次修改?在史学界是有不同说法的。过去一般都说是“一九二六年三月”^①发表的,其间并未作过修改。郭文首次提出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这在当时说来,对打开史学禁区无疑是个贡献,应予肯定。但郭文认为五一年又作了很大的改动,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分析》从首次发表到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共修改了几次?修改了那些内容?修改后和原来的意思有多大出入?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些不同时期的版本,现简介如下:

第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际,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了《分析》。该文开宗明义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就一目了然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这个首要问题。由于这一论述极为重要,遂即引起革命人们的普遍注意。

第二、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国农民》第二期全文转载了《分析》。转载时,编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中国农民》月刊是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被这样一个刊物所转载,进一步证明《分析》一文的重要性。当然,转载后影响就更大了。

第三、一九二六年三月,经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修改,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章的结构和文字的加工,如第一段由原来的四百四十多字缩减为不足二百字。将大资产阶级“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改为“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等等。这次修改后,《分析》基本定型,成为现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

第四、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更好地培训农运骨干,农讲所又重印了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的《分析》,发给学员作为课本使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讲了这一专题”。^②

第五、一九五一年八月,《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作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

首先在段落划分上，更加明细。对各阶级的分析，取消了原来的“第一”、“第二”冠称。结论部分作了提炼与概括。其次，把“生产工具”改为“生产手段”，把“流动资金”改为“资金”，把“主力”改为“领导力量”等等。

二

郭文一发表，史学界就引起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分析》原文无领导权思想，是后来加进去的。理由是：第一，“主力”不等于“领导力量”；第二，说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还提“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说明这个时期他在认识上还未解决领导权问题。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分析》一九二五年版本虽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但它仍包含有领导权思想。理由是：第一，“主力”与“领导力量”的含义基本相同；第二，毛泽东同志当时提“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是策略问题，不足为奇。我们原则上同意后一种看法，认为《分析》一文提出了领导权思想。其理由是：

第一，毛泽东同志此时对领导权问题应该是明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党的三大后就开始探讨了。当时国共两党实行合作，资产阶级右派害怕工农运动，在统一战线内部极力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为适应斗争需要，纷纷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领导权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已提出并明确了这一问题。大会决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③这是全党对领导权的最早提法，也是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毛泽东同志的《分析》一文是在四大十个月后发表的，此时四大精神已传达到全党，毛泽东同志不会不了解这一精神的。四大前党内对领导权的探讨，他也是应该知晓的。

第二，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领导权问题是明确的。

就在毛泽东同志首次发表《分析》一文前不久，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写道：本人“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一思想与《分析》是一致的，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表述。就是说，“无产阶级要联合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④，以反对帝、官、封的统治。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一九二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和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⑤“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这一提法在当时说来是最完善的，就现在看来也是无懈可击的。联系到四大前其他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四大的决议，毛泽东同志这一提法是顺理成章的。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他自己巨大才华的溢露。

第三，“主力”和“领导力量”，在当时是一个意思。

首先，党内当时对领导权问题有多种提法，提“主力”的不独毛泽东同志一人。瞿秋白同志的提法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主力军。”^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干”。^⑦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骨干”。^⑧李大钊同志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⑨邓中夏同志的提法是：“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⑩周恩来同志的提法是：“工人

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①此外，还有：“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②等等的提法。所有这些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一样，其意思都是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应当掌握革命领导权。出现多种说法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党处在幼年时期，对领导权认识还不够深刻。在四大以前，还处于个别同志的探讨阶段，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是不太明确的。“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③党的四大提出了领导权问题，然而党内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明显地滋长起来，他胡说什么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在统一战线内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放弃领导权，向资产阶级投降；而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否认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样是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多种说法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为了团结大多数，有的同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得不隐晦婉转，以免挑拨者从中钻空子，进行破坏。

其次，毛泽东同志提的“主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和后来我们所说的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论从内涵和外延来说，都是不大相同的。大家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建立有统一战线，我党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领导。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以工人运动为主。工人阶级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反帝、反军阀的主力，如“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等，工人阶级的确是主力。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党的工作重点也由工人运动转为农民运动，党在广大农村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农民明显地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主力”，是有所不同的。也许由于这种缘故，作者后来进行了修改，应该说这是允许的。正象作者将“生产工具”改为“生产手段”一样，在不违反原意的前提下，这种修改，是无可非议的。

再次，不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的修改说成是“增加”。毛泽东同志对《分析》的两次修改，都是在不违反原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任何一个作者在再版他的作品时应有的权利。对这样的修改如有疑义，提出看法，也是应该欢迎的。但决不能把修改说成是“增加”。增加，是指原来没有，后来加进去的，也就是说《分析》一文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的几种版本中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在五一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加进去的。然而，从以上事实看，并非如此。因此，郭文把“修改”说成是“增加”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文为了强调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在“增加”一词前面又加了一句：五一年“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添油加醋的作法，给理论界造成混乱，给对《分析》的评价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四，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一文中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而且还论述了农民同盟军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对各阶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有组织的集中”，“特别能战斗”，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最高的评价。接着他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即中农、半无产阶级即贫农和无产阶级即雇农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他们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值得大大注意。从而为无产阶级找到了可靠的同盟军。

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若离开农民，革命将很难成功。同样，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若离开农民，领导权将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具有妥协、动摇的两面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

右手打倒共产党”，正是这一阶级特征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又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暂时的同路人。

从以上分析看，作者在文章中虽未明确写“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而只写了“主力”，显然这“主力”就是指的“领导力量”。因为他决不会主张由那“半反革命”的中产阶级来领导，也不会赞成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只能由特别“集中”、“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表述。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过“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⑭证明此时他还未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欠妥。众所周知，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的。这时的国民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打着孙中山这面旗帜，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更好地开展工农运动，以壮大我党力量。表面是国民党领导，实际是共产党领导。出于策略考虑，有时提革命的国民党是领袖不是不可以的。党中央这样提过，其他同志也这样提过。如周恩来同志曾说：“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⑮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我党发表的声明中也说，中山先生逝世了，然而他“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⑯党中央的声明中强调了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毛泽东、周恩来的文章强调了“革命的国民党”。很明显，这“革命分子”和“革命的”是指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这种有分寸的提法，同陈独秀一味向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有原则区别。

三

对《分析》的评价，在郭文发表以前较一致，评价比较高。郭文发表后，引起争论，评价渐低。两种评价，那一种恰当？谈谈我们的浅见。

在郭文发表以前，在现代史、革命史、党史教材里，一般都把《分析》上了大小标题，有的还上了节的目录，进行重点讲授。认为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最明确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都给了科学的分析和天才的论断，正确地解决了过去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对待资产阶级问题。”它“深刻阐明了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⑰也有的认为：“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航向，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⑱

上述两种说法，我们认为除个别地方有拔高外，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同时期党内其他同志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论述，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篇论述和《分析》相比，都是逊色的。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确是一篇光辉的著作。

同时，我们也认为过去评价为“纲领性文献”，有点拔高，也不够确切和严密，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分析》重点讲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包括对无产阶级的分析，这自然也谈到了领导权问题，所以它只是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概括成明确而系统的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③这才完整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这时才称得上是纲领性文献。

其次，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党内还未形成领袖地位，他的《分析》一文还未被陈独秀所采纳，甚至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而未能在《向导》上发表。因此，文章的实际影响受到了限制，只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才逐渐被全党所接受。

郭文发表后，理论界有些人对《分析》的评价越来越低。不少教材中连小标题也未上，只作一般介绍，这可能与郭文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下面转引几种版本的评价，可以看出大概：

“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在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作出了贡献。”^④

“毛泽东的《分析》和同时发表的一些文章，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⑤

“在党的四大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了。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和党的一大批领导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它的初步形成，对于推动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⑥

有的教材在论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把毛泽东同志的《分析》与李达同志的《土地与农民》、瞿秋白同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等并列叙述，没有突出《分析》的重要性，显然，《分析》已降为一般性文章。

上列引文有如下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分析》一文包括了同时期其他同志的理论贡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应该首先肯定。但是，毛泽东同志有他独特的理论贡献。就《分析》一文来说，它吸收了其他文章的论点，又超过了其他文章的论述，成为同时期的代表作，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否则，我们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二，现在理论界一般都把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作为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连续发表了《分析》、《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一组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著作，其中《分析》则是它的主题文章。对于这样一篇重要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仅用简短的几句话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第三，除个别讲义把《分析》上了小标题外，㉔多数未上。我们认为这样一篇重要著作在党史教材中应当上小标题。过去作专题讲授未必完全必要，现在连小标题也不上，在讲授中自然就不能突出，其结果势必降低它的作用。为摆正集体和个人的正确关系，在上小标题时应注意分清主次，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提出”放在前面，把“毛泽东的《分析》的发表”放在后面，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正确评价《分析》一文的重大历史意义，也是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依据事实，从实际出发，既不拔高，也不贬低，给予公正合理的评价，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 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第243页。
- ② 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编《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书，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③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 ④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2页。
- ⑤ 《农民运动》第8期。
- ⑥ 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 ⑦ 瞿秋白(笔名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
- ⑧ 瞿秋白《五四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 ⑨ 李大钊同志在纪念“二七”及追悼列宁的演说，见《新学生》第14期。
- ⑩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见《中国工人》第2期。
- ⑪ 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⑫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新青年”之新宣言》。
- ⑬ 李立三《党史报告》。
- ⑭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前途的影响》。
- 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页。
- ⑯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 ⑰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⑱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74年版本。
- ⑲、⑳、㉑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59页、1211页、1369页。
- ㉒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修订本)第6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 ㉓ 湖南师院等八所师范院校1981年9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使用本)第一册第172页至173页。
- ㉔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上册(修订本)第40页至41页。
- ㉕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第二次修订本)第36页。